试论我国导读书目的发展

田　磊

摘　要　我国第一部真正的导读书目产生于唐代,但唐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导读活动和导读思想萌芽。回顾导读书目和导读活动的发展历程,唐代以前主要是推行西周开创的礼乐制度,唐至清代主要以指导科举考试为目的,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读书目突显出文化竞争的作用。进入信息时代,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使导读书目的编制更加科学合理,出版环境与阅读环境的改变也使导读书目在内容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参考文献31。

关键词　阅读指导　导读书目　推荐书目　举要书目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iding Bibliography of China

Tian Lei

Abstract: China's first guiding bibliography produced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there had been guiding reading activities and ideology sprout before this tim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prevail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rom the Tang to Qing Dynasty, the main purpose of guiding bibliography was to guid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ince modern times, affected by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guiding bibliograph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cultural competition. When ente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and method makes guiding bibliography more scientific, and affected by the change of publishing and reading environment, guiding bibliography has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tent. 31 refs.

Keywords: Reading Guide; Guiding Bibliography; Recommendatory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导读书目是指针对某一特定读者群或出于特殊目的,围绕一专门问题对文献进行选择性推荐,以指导自学或普及知识而编制的书目[1]。阅读受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用以指导阅读的导读书目因而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本文依据这些特征将导读书目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梳理其从萌芽到完善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轨迹,以期为现代导读书目的编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1　导读思想的萌芽:礼乐制度下的导读活动

尽管唐代以前并未产生真正的导读书目,但一些教育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导读对于社会教化的作用,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开始了导读实践。

1.1　唐代以前的导读活动

1.1.1　孔子、荀子的导读活动

孔子和荀子已经采用了比较完善的导读方法。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推行周礼,其导读活动也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整理典籍宣扬自己的主张,"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认为"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记做《春秋》"[3]。他整理典籍坚持三个原则:"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不取"攻乎异端"的学说[4](18)。如果说"述而不作"是整理书目的一般原则,那么后两个原则就带有明显的价值选择倾向,具备了导读的意义。更明确的导读体现在其教学过程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教"[3],因此对于《诗》《书》《礼》《乐》的导读近乎完备,并通过五种方式实现:一是评价图书或篇章的旨意得失。他认为《诗》的主旨是"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二是指明图书的作用。孔子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三是指明阅读顺序,“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6],他指出个人成长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四是指明阅读方法。孔子认为诵读《诗》《书》须用周王朝的官方语言,五十岁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5]。五是把握导读时机。子贡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答“始可与言《诗》已矣”[5]。

荀子的导读体现在《荀子·劝学》篇中,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介绍图书内容,评价内容得失。“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7]又评价“《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二是指明阅读顺序。他认为从学习科目来说,要“始乎诵经,终乎读礼”[7]。三是指明阅读方法。荀子认为阅读首先要受良师指导,其次要尊崇礼法[7]。相比于孔子散见于各章的做法,荀子集中式的做法更具有导读的自觉意识。

1.1.2 庄子、王充、刘勰的导读活动

对学术源流的辨析和评价同样具有指导阅读的作用,庄子、王充、刘勰是早期的实践者。《庄子·天下》篇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与得失。该篇首先介绍了儒家典籍,认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8],指出墨家《非乐》《节用》主张的非乐、节用、节葬等思想违背了古时的礼乐制度,最后依例介绍了道家、名家、杂家等思想。王充在《论衡》中批判了神秘主义儒学的谶纬学说,其中,《书虚》篇批判了“为谲诡之书,著殊异之名”[9]的不实记载,并引《论语》《六经》《尧典》论证;《书解》篇介绍《春秋》《诗》《书》《易》等的内容、写作背景和价值,并对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案书》篇列举并评价了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论述了文学的起源、各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10],《原道》篇总述文学的起源,《宗经》《乐府》《诠赋》等篇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发展以及名篇的介绍具有很好的导读作用。

1.1.3 司马迁、刘安的导读活动

对于一书作者、内容、写作背景、编次等内容的介绍可视作该书的导读,汉代已经出现了单体作品的导言,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刘安的《淮南子·要略》即其代表。《太史公自序》介绍了作者的身世及家学传统,论述了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要旨和《史记》的写作背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写作原因及编排次序[3]。司马迁将古典目录学中介绍作者生平、学术思想、写作背景以及内容提要等几种解题手法融为一炉,是一篇内容翔实的导读作品。《要略》是《淮南子》一书的总结,该篇首先说明《淮南子》的编纂目的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11],坚持既论天道又言人事的编纂原则,最后详细阐述了全书二十篇的编纂次序及各篇的内容旨要。《太史公自序》和《要略》采用了不同的写作手法,但都阐明了写作目的、编纂次序及各篇的主要内容,并且也有了条别篇章、部次甲乙的分类意图,作者的初衷无疑是指导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全书的内容。

1.1.4 管子、颜之推的导读活动

培养阅读习惯是古人的另一个导读视角。《管子·弟子职》是一篇教导学生生活和学习的规范,管子指出学生应该根据老师教导的内容学习,首次诵读或有同学、客人到来时应站起来阅读,不懂的内容须及时请教,老师休息后同学之间仍需继续切磋,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12]。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后世称为“家教规范”,其《治家》篇对子孙珍惜书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科治”,要做到“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读圣贤书时要肃然起敬,出现五经及贤达姓名的废纸也不能用在污秽之处[13]。《勉学》篇勉励子孙“数岁以上…多者或至《礼》《传》,少者

不失《诗》《论》”,认为流传的书目都有讹误,因此“不可偏信一隅”。《戒兵》篇劝诫子孙不要信口言兵事,等到知识广博时方可研习。

1.2 萌芽时期导读活动的特点

导读伴随教育而生,科举制以前的教育主要是推行西周开创的礼乐制度,这一时期的导读活动也围绕礼乐制度进行。《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4],因此《诗》《书》《礼》《乐》是这一时期导读的主要内容。从导读方式来看,已经具备了导读的基本方法,但是作品体例并不完善。严格意义上的导读需要具备阅读对象、具体读物、阅读次序、阅读方法、版本五个要素[15],唐代以前的导读活动具备了前四种。《荀子·劝学》篇具备了导读作品的雏形,《论语》的导读散见于各章,其他著作仅出现了一两个导读要素,因此这些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导读书目。

2 导读方法的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导读书目

唐代敦煌经卷中的《唐末士子读书目》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导读书目[16]。导读书目只有在教育相当发达、读书治学成为风气、了解图书内容成为必要的时候才会产生[4](164),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图书数量足够多,二是有特定的阅读目的。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图书生产效率,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图书日益增多;科举制给普通民众提供了步入仕途的机会,读书的目的更加明确;唐代已经形成了太学、州学、郡学、县学和私塾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些都激发了指导阅读的需求,形成了导读书目产生的条件。从唐代科举制到清代鸦片战争,社会制度并无大的变化,阅读就在科举制的主导下进行,导读书目也以指导科举考试为宗旨不断发展和完善。

2.1 主要的导读书目及其体例

唐代杨松珍的《史目》、李肇的《经史释题》、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在介绍图书、指导治学方面对初学者都是非常有用的,具备了导读书目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针对初学者的特点严加甄别挑选并由浅入深地排列,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导读书目[4](165)。《唐末士子读书目》采用问答的形式向初学者推荐了35种读物,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推荐了23种图书,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解释了九经和三史。从内容来看,该书目包含《千字文》《开蒙要训》《论语》《尚书》等,是针对参加科举的初学士子开列的书目;从著录方式来看,包括书名、责任者、注释等,著录要素基本完备,但该书目没有指出阅读次序和阅读方法,带有初创时期的粗陋特征。唐代道宣编著的《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是第一部佛经导读书目,分大乘经正本、大乘律、大乘论、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贤圣集录七类,每类下详细注明了包含多少部、卷、纸、行,并说明译经年代、地点、译者,对于不同的版本有详细的说明和评价。该书目重点在于版本辨析,作者在序言中阐明编著原因是“重译广文多生倦怠,余此致因而演之”[17]。该书“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18],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梁启超评价其为“道宣录中最有价值之创作”。元代程端礼编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一部体例完备的导读书目。程氏将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读书方法融入到导读中,将读者分成启蒙(8岁前)、小学(8—15岁)、成年(15岁以后)三个阶段,列出每个阶段应读的书目并指明先后次序,如《小学书》毕,次读《大学》,次读《论语》,次读《孟子》,次读《中庸》等。该书目最大的特点是详细说明了每个阶段该读何书以及每种书的阅读方法,如在小学阶段“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行饭时使之记说一段”[19]。明代陆世仪也将学子按照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子开出三份不同的书目:《十年诵读》(5—15岁)、《十年讲贯》(15—25岁)、《十年涉猎》(25—35岁),每个书目中首先列出大类,如天文书、兵法书、古文、古诗等,大类之下再列具体书目及其读法。该书目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阅读的次序,除按年龄分阶段开列书目外,还特别强调“以上诸书,力能兼者兼

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不然则去其诗文,其于经济中或专习一家,其余则断断在所必读”[20]。二是包含了律法、经济、天文、地理、农田水利等图书,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由清代李颙口授、李世瑸手录的《读书次第》按照小学、礼、诗、春秋、易经、史、文选的次序编排,每类之下皆有小序,用以说明此类学术源流、图书优劣,之后列出具体书目并指明善本。该书目的特点是在传统的儒家经典外开列了大量的史书和文集,在编制体例上突出了善本和阅读次序的重要性,篇末强调“右经史文乃学人之急务,有余力则老庄管韩檀子鸿烈等集,或间一披览,以广其识可也……”,李世瑸认为该书目“由小学渐入大学,自经传徐及文史,步步有正鹄,书书有论断,真入圣之正门,为学之上路也”[21]。

2.2 科举制度下导读书目的特点

唐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导读书目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时期,主要有三个特点:

(1)导读内容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目的更加明确。《新唐书·选举志》明确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22],这一时期的导读内容主要是这些经典及其注疏。明末清初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书目中也相继出现了律法、经济、天文、地理、水利等实用性内容,但仍属于儒家经典的附属。

(2)编制方法逐渐成熟,书目体例日臻完善。唐代的两部书目一个偏重内容,一个偏重版本,元明清的三个书目在内容和版本的基础上详细说明阅读次序和方法,书目体例及编制方法已经成熟。

(3)编制主体为长辈或塾师,没有出现官方编制的导读书目。鸦片战争前虽然频繁出现改朝换代等大的社会动荡,但基本的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始终如一,因此没有出现带有拯救文化意图的官修导读书目。

3 导读内容的拓展:文化碰撞下的导读书目

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碰撞时期,出现了学习西方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在此背景下的导读书目也有了文化交锋的特点。

3.1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主要导读书目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学导读书目有1847年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和1890年裕德编撰的《经籍要略》。《经籍举要》收录图书176种,按经、史、子、集编次,全书有总序,每类之下有小序,每书之下有提要或案语,用以介绍图书内容、版本情况及阅读方法等。该书的特点是在集部之后按照用途列出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等8类书籍[23]。《书目答问》共5卷,按照经、史、子、集、丛编次,每书之下详列著者、卷数、版本。该书的特点是在四部之外增加了丛部,解决了综合类图书的分类问题;在版本选择上选取当时习见者中少缺误者,不追求宋椠元刻[24]。《经籍要略》是在《经籍举要》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借鉴了《书目答问》的分类原则,书后编有“劝学八则”。该书改变了《经籍举要》评价图书的案语体例,代之以阅读方法,另一个特点是编入了钦定、御纂书目[25]。

在守护中华文化的同时,一些维新人士也编制西学书目推广西方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和1902年编撰的《东籍月旦》。《西学书目表》收录图书352种,包括正表和附表两部分,正表分西学、西政、杂类3部28类,西学主要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类图书,西政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类图书,杂类介绍了部分西方人文科学及综合类图书[26]。附表包括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图书、近译未印图书以及中国人所著图书,并附有《读西学书法》一卷,指明阅读方法。在介绍西书的同时,梁启超意识到中国人学日语比较容易,虽然东学不如西学,但从东学入手是一个急就之法[27],因此编撰了介绍日本图书的《东籍月旦》。该书按照伦理、语言、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分类,偏重于对政治书

籍的介绍,他认为一切改革必须从社会教育入手,因此将伦理、历史、地理等置于首位[26],在介绍图书之后又列出相关的延伸阅读书目,并且首次列出每本书的价格。

3.2 新旧文化碰撞下的主要导读书目

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的碰撞下也形成了导读书目上的"整理国故"和"传播新学"两派。"整理国故"一派的主要代表书目有胡适1920年编制的《中学国学丛书》和1923年编制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者因收录文献过多不便使用,作者又将其删减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这一时期的国学书目失去了科举考试的风向标,因此个人色彩浓厚,梁启超指责胡适不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却收录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通俗小说,因此他编制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等对此进行修正。此外,"整理国故"一派还有1923年李笠编制的《国学用书撰要》、1924年章太炎编制的《中学国文书目》、1925年徐静修编制的《国学常识》、林语堂的《国学书十种》、李笠的《国学用书概要》等。

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学科划分更加细致,"传播新学"一派的导读书目呈现出专科化的色彩,传统的不入正统的戏剧等也受到关注,这类书目主要有1920年沈雁冰发表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1921年周学普的《近代戏研究参考书》、1922年吴宓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1923年西谛的《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和《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以及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和沈雁冰的《欧美主要文学杂志介绍》等。

3.3 文化碰撞下导读书目的特点

中西文化之争体现在导读书目上主要是科举制主导下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之争,新旧文化之争则体现在广义的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之争,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导读书目有以下特点:

(1)从内容来看,正统的儒家典籍地位日渐式微,科技类图书受到重视,这一趋势在明末"经世致用"思潮中即已发端,鸦片战争之后推向高潮。此外,专科导读书目逐渐兴起,儿童导读书目受到重视,仅1933年就出版了《儿童读物参考书目》《儿童读物目录》《儿童书目汇编》等。

(2)从目的来看,文化竞争的意图凸显。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总能以强大的力量融合外来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崛起显示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在两种文化的竞争中导读书目发挥出了文化竞争的新作用。

(3)从方法来看,借鉴了西方目录学的编制方法,主要体现在图书分类上。西学东渐至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之前,图书分类突破了原有的四部分类法,这一时期被称为"图书分类的混乱时期",按照改变程度可分为旧派、折中派和改革派[28]。《书目答问》在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丛部",显然属于旧派;《西学书目表》基本按照学科分类,属于折中派;《东籍月旦》完全采用编、章、节的现代编制体例,已经属于改革派。

4 导读原则的确立:马列主义的传播对导读书目的影响

4.1 主要的马列主义导读书目

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的"五四运动"大力宣传了马列主义,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列主义导读书目逐渐出现。1920年《共产党》刊载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1924年《中国青年》刊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目》,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列了以马列文献为主的《整风文件》,1948年华北局印发了《干部学习书目》,1951年《学习》上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自学提纲》。此外还有恽代英写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澄宇的《国难期间青年应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施存统的《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等[15]。这些文章明显地具有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论述问题之后都列出了介绍马列思想、俄国革命、中国社会问题的相关书目,有的甚至还推荐了没有来

得及翻译的外文书籍。

4.2 马列主义导读书目的特点

马列主义导读书目大多产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类书目属于专科导读书目,涉及的范围较窄,加之图书数量本身较少,因此收录的图书种类普遍较少,导读内容也十分简单。书目大多以文章的形式呈现,不足以形成专门的导读图书。受苏联目录学党性原则的影响,这一时期导读书目的最大特点是确立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无论是编制方法还是编制思想,无论是导读书目还是目录学著作,都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原则影响到后来导读书目的编制。1982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编制的《目录学概论》系统论述了这一原则在导读书目编制中的应用[15]:导读书目编制的目的是“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提高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诸多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选材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本主题的论述、党和政府有关的指导文件……”,编排次序时要“把有关本题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或论述以及党和政府的指导性文件排在首要地位”。及至今日,马列主义指导原则仍然是我国书目编制工作的首要原则,《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列类即是如此。

5 导读技术的创新:信息时代的导读书目

21世纪以来,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使人们进入了信息时代,科技推动阅读发展使导读书目也有了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编制技术的创新上。

5.1 统计方法运用

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使导读书目能够博采众长,避免浓重的个人色彩,主要有三种形成方式:一是汇集前代多种导读书目,取其交集编纂而成,如1999年出版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该书将21世纪出版的80种导读书目所收录的2503种图书按推荐次数降序排列,然后选出前289种作为首批导读书目[29]。二是邀请多位著名学者开列书单,取其交集编纂而成,如200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公布的两份导读书目。三是统计各种图书销售、借阅排行榜及获奖书目,取其交集或排名靠前的图书编纂而成,如2012年编制的《中国基层图书馆基本藏书推荐书目》就是根据各图书馆、书店的借阅和销售排行以及各种获奖书目编制而成[30]。

5.2 网络平台发布

信息时代以前的导读书目通过图书、期刊、报纸、书信、文件等方式传播,这些方式受众面窄、传播效率低。网络平台的使用不仅使读者能够参与图书的评价和投票选择,而且能够迅速推广选择的结果,提高了效率。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发布的《大学生应读书目》,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07年发布的《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百种优秀书目》,以及哈佛大学的推荐书目等都是通过网络传播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3 导读书目与书评渐趋融合

基于推介图书的共同目的,导读书目与书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书评可看作是一书之导读,导读书目可看作是群书之书评。尽管书评偏重于对图书内容及影响力的深度评价,导读书目有指明阅读次序及方法的要求,但两者推荐图书、引导阅读的目的是一致的。单本书的导读、微书评和书评汇集的出现使我们已经不能以篇幅长短和数量多少来区分书评和导读书目,间接或直接的推荐方式或可成为勉强区分两者的标准[31]。

在两千年的书目发展史上,导读书目因其数量少、影响小而不受重视,但其对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反映却是最迅速的,发挥目录的实用性功能也是最彻底的。导读书目的发展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进入信息时代,科技进步为导读书目的编制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出版环境、阅读环境的改变又赋予导读书目新的内容和使命,关于书目的书目、阅读疗法书目的出现即是导读书目在内容

方面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彭斐章.目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72.

2 彭斐章.阅读的时代性与个性[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2):9-23.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235-238.

4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5 孔子.论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29-81.

6 王肃.孔子家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76.

7 荀况.荀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6-8.

8 庄周.庄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15-216.

9 王充.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57-59.

10 刘勰.文心雕龙[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1 刘安.淮南子[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681.

12 管仲.管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320-323.

13 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48.

14 崔高维.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5.

15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4-209.

16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1.

17 释道宣.大唐内典录[EB/OL].[2016-12-20]. http://www.qldzj.com.cn/htmljw/1528.htm#j1528-44.

1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12.

19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合肥:黄山书社,1992:28.

20 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 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55-58.

22 彭斐章.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9.

23 信沪成.龙启瑞和他的《书目举要》[J].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4):38-39.

24 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2.

25 李立民.晚晴国学导读目录的初兴及其社会文化功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51-54.

26 柯平.文献目录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68-69.

27 梁启超.东籍月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83-83.

28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M].北京:中华书局,1937:139-140.

29 王余光,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M].北京:光明出版社,1999:2-7.

30 郭腊梅,邓咏秋.切实提升基层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质量和书目推荐水准——编纂《中国基层图书馆基本藏书推荐书目(第1版)》的说明[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2):105-107.

31 王友富.导读发展与前瞻[J].图书馆杂志,2000(9):14-16.

(田 磊 馆员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7-02-08